

從歷史記憶看陳寅恪與 乾嘉考據的關係

• 羅志田

時代的變遷往往影響人們對歷史上人與事的觀感。錢鍾書先生注意到，對於人事的「後世定論」很可能與「當時公論」不同，如梁簡文帝對謝靈運的評論就「似是當時公論，卻未成後世定論」。他並注意到^①：

梁文之有江淹、劉峻，猶宋之有鮑照，皆俯視一代。顧當時物論所推，乃在沈約、任昉；……及夫世遷論定，沈、任遺文中求如《恨》《別》兩賦、《絕交》廣論之傳誦勿衰者，一篇不可得。

不過，世遷然後論定也是相對的，更要看對甚麼人而言。對文學評論家來說，「後世定論」或可為準；對史家言，則把握「當時公論」顯然更為緊要。讀史者稍不謹慎，即容易受「後世定論」之影響，而忽略「當時公論」之意義。

實際上，「後世定論」也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的。王汎森先生說：「人們的歷史記憶像一塊黑板，可以不斷地添寫、修改、擦拭。」而歷史記憶也確

實需要不斷地「再生」(reproduce)才能延續。這一不斷「再生」的行為與過程，可以是有意的，也可能是無意的。但往往不僅「受自然的限制，也可能受社會政治情境所左右」^②。後世凡欲對前人下定論者，實即立意參與歷史記憶的修訂或重塑；如試圖為甚麼人正名或貶斥某人之時，胸中或不免已先有莊子所謂「成心」在，其對論據的選擇和論證無意中便會受此「成心」的影響，結果重塑出的形象有時可能反去真相更遠。

對史家而言，無意中形成的集體歷史記憶 (collective memory) 似更值得注重。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史家對集體歷史記憶的關注日見廣泛，這大致可溯源於二十世紀60年代法國史學界對集體心態 (collective mentalities) 的研究。心態史家感興趣的是諸如家庭生活、風俗習慣、社會觀感和民間宗教一類的大眾文化，但側重的不是具體的觀念或事件，而是其反映的思想結構。這些題材實際都牽涉到對往昔之「慣性權勢」的認同與

後世凡欲對前人下定論者，實即立意參與歷史記憶的修訂或重塑；如試圖為甚麼人正名或貶斥某人之時，胸中或不免已先有莊子所謂「成心」在，其對論據的選擇和論證無意中便會受此「成心」的影響，結果重塑出的形象有時可能反去真相更遠。

否，從而或多或少導向集體歷史記憶的性質和信息資源這樣更深層次的問題，結果開拓出一片廣闊的史學新領域。

無意中形成的集體歷史記憶其實遠不止作用於民間的大眾文化，作為社會精英的基本思想資源，它有時甚至可以影響到國家發展方向這樣的大計。黃濬在《花隨人聖盦摭憶》中提出：

吾族有史以來，武功文物，當以有唐為極軌。唐之武功文物，當以開元為極盛。過是，則盈而昃矣。後此不可知，宋若明，制度材力，皆視唐相去遠甚。史冊典章，以及詩文稗記，可資證吾說者，無慮千百。

他觀察到：由於「吾國昔日區別四民，讀書知理者，唯士一途。士之咕嗶者，非周秦六經，即馬班兩史。其腦中所縈憶者，多中古以上事迹；其所濡觸者，卻為現代之物華。日溺於近，而心馳於古，於唐以後政治社會興衰遞嬗之迹，百舉俱廢之由，反昧昧然。故一旦受侮發憤，欲刺取吾國固有長技，侈舉與西歐對峙者，率皆墟墓簡策間言」^③。

黃濬這一觀察頗有所見。讀書人的眼見之實與所讀之書有所隔，在承平時固無大礙，遇事則其思想資源實在有限。從這一角度言，當清代西潮入侵之時，經學特別是以考據為中心的乾嘉漢學確實難以「經世」，而道咸後興起的今文經學的經世取向仍然是回向周秦之世。清代整個史學本處邊緣地位（馬班兩史主要不是作為史書、而是作為文章在讀），而清代文字獄造成的對近代（指清人的近代）史的迴避，更使唐宋史事不為多數士人所熟

悉。清人也曾有回向歷史尋找思想資源的舉措，如元史即因其有「夷狄入主」這相似的一面而一度頗受注重（主要是應對滿漢關係而非中外關係）。而真正能對西力東漸局勢起參照作用的「固有長技」，恐怕恰是與「夷狄」關係較洽的唐代處理夷夏關係的歷史經驗。舉周秦「墟墓簡策間言」而與西歐對峙，其不能「經世」甚明，結果是沿西學為用的方向走上中學不能為體的不歸路。

從集體歷史記憶的視角看，清儒之所以注重元史，恐怕也與他們不熟悉唐代史事這一潛在因素相關。唐代的形象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中其實早有偏差：唐宗室與「夷狄」的密切關係，在有唐一代已漸為官家所諱，經其添寫、修改和擦拭的歷史記憶復經最重「夷夏之防」的宋儒「再生」之後，已大致不為後來的史家所知，這大概也是清儒不往唐史尋找思想資源的一個重要原因。直到近人陳寅恪重新「發現」並重建唐與「夷狄」的特殊關係，唐代處理夷夏關係的歷史經驗才逐漸引起學人的關注，而唐代的歷史「形象」也為之一變。

有意思的是，像陳寅恪先生這樣一位不應該被遺忘的史學名家，在我們史學界的集體歷史記憶中也確曾在相當一段時期裏基本被「遺忘」，直到近年才又被「重新發現」。或者即因為這一度的遺忘，陳先生本人以及「陳寅恪史學」的形象似乎都已使人感到生疏，於是出現了许多試圖修訂或重塑我們歷史記憶中的「陳寅恪形象」的努力。在二十世紀80年代召開的紀念陳寅恪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季羨林先生注意到，佔一半的人都說陳寅恪治學與辯證法或唯物主義暗合，「這就與馬克思主義相通了，這可能高了」，但季

唐代的形象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中其實早有偏差：唐宗室與「夷狄」的密切關係，在有唐一代已漸為官家所諱，經其添寫、修改和擦拭的歷史記憶復經最重「夷夏之防」的宋儒「再生」之後，已大致不為後來的史家所知，這大概也是清儒不往唐史尋找思想資源的一個重要原因。

先生卻感到「說不出高在那裏」④。這些人當然都意在為陳先生「正名」，但陳在史學上的地位，是否應該這樣來論定，季先生覺得還可再研究。

近年學界忽然又對陳寅恪與乾嘉考據的關係發生了爭議⑤。說陳寅恪「沿襲清人治經途術」的，包括陳的及門弟子蔣天樞先生；而認為陳治學並未繼承乾嘉，乃是「直接繼承宋賢史學並有所發展」的，是陳的另一及門弟子王永興先生⑥。兩位先生與陳寅恪的關係都超過陳的一般學生，他們也都有意識地追隨乃師的治學取徑，而所見竟大不相同，這確實說明所謂「陳寅恪史學」的形象已「模糊」到何等程度。

這一現象提示着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研究）仍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過去對歷史人物的討論比較偏重於評價，其實恐怕首先應弄清史實。而對學術史人物的研究，或者更需要依孟子提出的「論世知人」的方法，將其置於學術思想演化的內在理路及其所處時代的社會環境這樣的縱橫大框架之中進行考察，通過「論世」以「知人」，特別應注意被研究者從受學到立說這一思想觀念的形成、發展和演化過程。若據此考察陳寅恪與乾嘉考據的關係，結論或者就會不同。

如果回到當年的社會學術環境，陳寅恪是否受乾嘉考據的影響本不應成為「問題」。周予同先生觀察到：乾嘉時代的考據學者「都是科舉出身，熟讀『四書』；他們在『漢學』方面雖有專長，但對於清政府崇奉的『宋學』，也經涉獵」⑦。這一觀察非常深刻，任何學者從少年起的受學經歷都會影響到其成年後的學業。清代經學中以乾嘉考據為代表的「漢學」，曾控制學術「話語權勢」達百餘年，而積威之餘波，更

延伸到民國初年。故出生受學於清世的學人，沒有受到乾嘉考據影響的，恐怕極少。而陳寅恪早年對清代經學確實下過很深的功夫，與他關係極深的俞大維已論之甚詳⑧。

最能說明陳寅恪與乾嘉考據關係的，是他在〈與妹書〉中被廣為引用的一段：「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一佛敎……」⑨對這段話汪榮祖先生與我的理解便曾頗不同，我前在文中引述汪先生的解讀時，曾說他「厚誣前賢」，引起汪先生的抗議，我已誠懇致歉（詳見《近代史研究》1999年2期汪先生和我的「來函」）。我感到高興的是，汪先生雖然仍不滿意我的答覆，但在很大程度上實已接受我的觀念。汪先生原以為「這一段話也可作寅恪一生治學的綱要看」，這是我不同意的主要之處；在他的〈再回應〉中已說「超越乾嘉原是一個目標，沒有人說過是『治學綱要』」。我的理解是我們在這一點上已基本達成共識，故關於文字解讀的部分便不必再言，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原文。

不過這個問題顯然仍在困擾着研究陳寅恪史學觀念的學者，我的一些看法似還有必要重申。從今存《陳寅恪文集》看，除《柳如是別傳》的撰寫有明確的在方法上異於乾嘉（立異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超越）之意外，其餘大的著作如《隋唐史二論》和《元白詩》等，以及陳的多數單篇論文，都不好說有特別針對乾嘉之意。以陳先生自己提倡的考證方法（即不但要找出可能的關聯，而且要指證實際的聯繫，更要排除其他可能的關聯），要證明他的這些著作意在超過乾嘉，恐怕是難以落到實處的。

近年學界對陳寅恪與乾嘉考據的關係發生爭議。說陳寅恪「沿襲清人治經途術」的，包括陳的及門弟子蔣天樞。而陳的另一及門弟子王永興認為，陳治學並未繼承乾嘉，乃是「直接繼承宋賢史學並有所發展」的。兩位先生與陳寅恪的關係都超過陳的一般學生，而所見竟大不相同，這確實說明所謂「陳寅恪史學」的形象已「模糊」到何等程度。

實際上，史學非乾嘉之所長，而陳寅恪更視清代史學為「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詳後），如果陳先生真以超越乾嘉為主要目標，他當多治經而少治史（陳先生確具治經之實力）；比如他提及的「中藏文比較之學」，在中國傳統學術分類中當屬小學，即是乾嘉諸老的強項。就算陳先生專選清儒相對忽視的史學作為超越的領域，也當針對乾嘉人之所長超而越之；但陳寅恪一生不止一次說過他「不敢觀三代兩漢書」（這有其特定的針對性），此正乾嘉諸老之所長，何以他偏不讀乾嘉之人所讀書、不治乾嘉之人所治而另闢蹊徑？陳寅恪畢生所治，多半為乾嘉學術的弱項，若陳先生專立意在在乾嘉諸老所不甚重視甚至不知道的方面去「更上一層」，豈非勝之不武？

但陳寅恪〈與妹書〉的那一段話仍足以說明「乾嘉諸老」正是陳先生在方法上有意要超越的目標（不過不是他治學的主要目標）。惟陳氏認為真正能超越乾嘉考據者，還不僅是「中藏文比較之學」，而是以「文化史」的方式來解釋文字。當年章太炎讀了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社會學著作，對其「往往探考異言，尋其語根；造端至小，而所證明者至大」一點，頗有心得。於是重新「發現」惠棟、戴震的文字訓詁，也都有類似功用，可藉以發現中國「文明進化之迹」。蓋古事不詳，「惟文字語言間留其痕迹，此與地中僵石為無形之二種大史」^⑩。

後來章門弟子沈兼士於1935年作了一篇〈「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以考古學的方法，從文獻和文字兩方面探檢字義之原始意義：在文獻方面「直接觀察其歷史情形，玩味其文句解釋」；文字方面則「從形音義三方面貫串證發其當然之義類」；可說頗得乃師

真傳（楊樹達當時已注意及此，他在日記中說：「沈兼士送所撰『釋鬼』文字來，申其師說也」^⑪）。陳寅恪在讀了沈氏文章後，甚表敬佩，其致沈兼士書說：「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而沈文是當時唯一足以當此定義者^⑫。讀沈文當知陳先生對「文化史」的定義與前引太炎所見略近，其指謂大約即當考出文字本義及隨歷史發展而演變之各時代意義，這樣可做到字義明則歷史意義明，與過去由訓詁見道的經學取向仍相類，但所欲明之「道」卻有了極大的改變。

注重語言文字與歷史的關聯，是近代西方「經學」（Classical Studies）的正宗，也曾是西方「漢學」（Sinology）的主流（1911年法蘭西學院為伯希和[Paul Pelliot]特設的講座就名為「中亞語言、歷史與考古」，而伯希和固向有「漢學家」之身份認同也）。在西方史學中，這一取向本以德國的蘭克學派最為講究，而英國人的文化史（百年前日本人多稱之為「文明史」，當時中國人往往因之）研究也一直有此流派：二三十年前英國左派史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著《關鍵詞》（Keywords）一書享譽全球，其所遵循的正是章、陳所指謂的取向。不過這種治學方式要求非常深厚的基礎，太炎正因其小學修養深邃，故於英國「文明史」派的取向能有觸類旁通的領悟。

長期留學歐洲的陳寅恪對此容易產生「了解之同情」，自是順理成章；而其在中國傳統小學方面的修養，也由此可見。俞大維說陳先生本主張「讀書先識字」，或者即是在此意義上「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吧（可資對比的是，同以小學見長的楊樹達先生雖然敏銳地看出沈兼士在申其「師說」，但

陳寅恪〈與妹書〉的一段話足以說明「乾嘉諸老」正是陳先生在方法上有意要超越的目標。惟陳氏認為真正能超越乾嘉考據者，還不僅是「中藏文比較之學」，而是以「文化史」的方式來解釋文字。

當日顯然不以此為高明。到1951年他追隨時代新潮，學習唯物史觀的《社會發展簡史》以研究金文與周代社會的關係，進而回頭讀嚴譯《社會通詮》，終領悟到其中「可證古文字者極多，殊可喜」；不久即寫出數篇頗受《社會發展簡史》影響但仍類「文明史」取向的古文字詮釋文章^⑩。但陳先生是這一學術取向的解人並不意味着這就是他主要致力的學術方向。

以史家為學術認同的陳寅恪顯然更推崇宋代史學，他不僅說過「中國史學莫盛於宋」，並明確指出：「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且陳先生根本認為「清代經學發展過甚，所以轉致史學之不振」。故「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於經學之一途」。而「研治史學之人，大抵於宦成以後休退之時，始以餘力肆及，殆視為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⑪。所謂史學僅「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顯然是陳先生寫作時文學的藝術比興壓倒了史學的客觀事實，固不免稍失之偏頗，近人杜維運駁之甚力^⑫。但清儒史學成就雖多可觀處，終無《資治通鑒》一類大手筆，大概應是不爭的，這也正是陳先生着意之處。

如果要說超越，陳先生最大的願望恐怕是超過宋代的《資治通鑒》。最了解陳寅恪的俞大維說，陳先生平生志願，在寫「中國通史」與「中國歷史的教訓」，王永興先生認為兩者合之即「通鑒」之意，竊以為較得陳氏初衷^⑬。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自序中說^⑭：

吾國舊史多屬於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鑒》一書，尤為空前傑作。今草茲稿，可謂不自量之至！然區區之意，

僅欲令初學之讀《通鑒》者得此參考，或可有所啟發。

戰亂之年，生死須臾可至，學者多急急出其所得。陳氏此序，去掉表面的謙退之詞，正欲與《通鑒》比高低，而坦然自認在唐代一段，已比《通鑒》有過之也。

該書中也有特別明顯的具體例證，陳先生說^⑮：

唐代武功可以稱為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詳究其所以與某甲外族競爭，卒致勝利之原因，實不僅由於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國武力攻取之道，而為之先導者也。國人治史者於發揚讚美先民之功業時，往往忽略此點，是既有違學術探求真實之旨，且非史家陳述覆轍，以供鑒誠之意。故本篇於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國勝利之本末，必特為標出之，以期近真實而供鑒誠，兼見其有以異乎誇誣之宣傳文字也。

這段話有抗戰這一時代「今典」在，余英時先生已注意到：「這裏兩用『鑒誠』一詞，最可見此書的命意所在。」^⑯陳氏著書的心態，實已躍然紙上。

除超越宋賢以外，陳寅恪學術的另一主要努力方向，乃是在預西方漢學之流並駕而上之。這方面的言論不僅見於公開發表的著述，也見於其一些私人通信。不過這與本文的題目無關，就不贅述了。遺憾的是，由於國家政治局勢的發展和個人身體的變化，陳先生治史之路實未能盡按其早年之計劃發展；不僅新的「通鑒」未能寫出，就是從西式「小學」治史的「預流」努力也在中年後就大致放棄，這是

最了解陳寅恪的俞大維說，陳先生平生志願在寫「中國通史」與「中國歷史的教訓」；王永興認為兩者合之即「通鑒」之意，竊以為較得陳氏初衷。遺憾的是，由於國家政治局勢和身體健康情況，陳先生不僅未能寫出新「通鑒」，就是從西式「小學」治史的「預流」努力也在中年後就大致放棄，這是他的治學取向和方法受到後人誤解的重要原因。

他的治學取向和方法受到後人誤解的一個重要原因。

簡言之，若採取「論世知人」的取向，由於「漢學」在清代長期處於「霸權」地位，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之推崇「宋學」者，莫不先在漢學意義上的考據方面狠下功夫以確立自身的發言權，然後敢言漢學之「龐雜破碎」與宋學之「幽玄高妙」（王國維語）^⑳。從這個意義上言，陳寅恪無疑更推重宋學，但其青少年受學時期曾對乾嘉經學下過相當大的功夫，後來在國外學習時更因西方「經學」的啟示而有意在訓詁方面超越「乾嘉諸老」，也是不爭的事實。努力強調或否定陳寅恪是否受乾嘉考據的影響，都或不免以學術門戶觀念的「成見」看人，其實是看輕了前輩，既無必要也不合實際。

註釋

① 錢鍾書：《管錐篇》（四）（北京：中華書局，1979），1393、1406-1407。

② 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當代》，第90期（1993年11月1日），頁40。

③ 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頁26-27。

④ 季羨林：〈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閉幕詞〉，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頁28。

⑤ 參見汪榮祖：《陳寅恪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頁40-51、243-49；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頁238。

⑥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86；王永興：〈陳寅恪史學的淵源和史學思想述略稿〉，《學人》，第10輯（1996年10月），頁165-95。

⑦ 周予同：〈有關中國經學史的幾個問題〉，載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701。

⑧ 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載《談陳寅恪》（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頁2-6。

⑨ 《學衡》，第20期（1923年8月），頁18-19。需要說明的是，陳先生這段話是專門針對學藏文所說，而非討論其治學取向與乾嘉考據的關係，說詳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361-63。

⑩ 章太炎：〈致吳君遂書〉，載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72。

⑪ 《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86-202。楊樹達語見其《積微翁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14。

⑫ 陳信收在《沈兼士學術論文集》，頁202。

⑬ 參見註⑩楊樹達，頁315-21。

⑭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38-39。

⑮ 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1-14。

⑯ 註⑥王永興，頁167-68。

⑰⑱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首頁；頁129。

⑲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21。

⑳ 參見註⑨羅志田，頁302-75。

羅志田 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等。